

ZHONG YI

第二卷

中医哲学史

程雅君 著

ZHIXUESHI

魏晋至金元时期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ZHONG YI

中医哲学史

SHEXUESHI · zhongyi

张其成



ZHONG YI

第二卷

程雅君 著

中医哲学史

ZHONGYI
ZHEXUESHI

魏晋至金元时期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哲学史. 第2卷, 魏晋至金元时期 / 程雅君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12
ISBN 978-7-80752-728-2

I. 中… II. 程… III. ①中医学: 医学哲学—哲
学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R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2922 号

中医哲学史(第二卷 魏晋至金元时期)

程雅君 著

责任编辑	侯跃生
封面设计	李 南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8)84122206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26.375
插 页	1
字 数	63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728-2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一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自去年1月正式成立，至今已近两年。一方面它在新一轮中医存废之争中，为保卫中医、从学理上论证中医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举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哲学和中医文化的研究，推动了中医产业的国情调研和振兴中医的对策研究，引起国家决策层的重视，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这项工作的同志在大好形势下又深感力不从心，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而骨干力量太少，主要是缺少一支既懂中医又懂中国哲学的专业队伍，中医哲学学科建设落后的情况影响了人们对中华医道的内容、特色、优势和发展方向的认识，因而也影响了振兴中医药事业的积极开展和全面推进。

中医哲学专业人员的奇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学科体制没有一条培养这方面人才的顺畅渠道造成的，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近现代中医被边缘化，有关方面对开展中医哲学研究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意义认识不足，因而也没有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在过去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学科，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等都不甚明确，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

学者屈指可数。中国哲学研究者需要有哲学、宗教、历史和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背景，但如果对中医没有由“术”到“道”的了解乃至“道”进于“技”的体验，他就很难成为一个中医哲学研究的专家。另一方面，学中医出身的人，即使对中医古籍和中医学史亦有相当根柢，但如果对儒、道、释哲学（中）、西方科学哲学（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没有深入研究和相契的理解，也很难把握中华医道之根本精神和未来发展方向。

正在大家感慨这方面人才难得之时，一位青年学者不期然地来到了我们中间，他就是去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做二期博士后研究的程雅君同志。他的两位合作导师分别是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会长罗希文研究员和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孚琛研究员。

有段时间雅君住在研究生院，间常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谈，谈他的求学经历，谈对中医哲学的理解，特别是谈写作四卷本《中医哲学史》的计划和基本思路。他认为莫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而成熟于金元时期的传统中医哲学是以儒为魂，以道为体，以释为用，从而形成了“三教合一”的中医哲学理论体系；未来中医哲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魂，以传统中医哲学为体，而以西方近现代医学与科学哲学的方法为用，走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道路。他说这个思路受到了我提出的“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启发，从“三教合一”到“三流合一”就是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规律在中医哲学史上的具体体现。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促使我更加关注传统中医哲学中的儒、释、道三教关系问题，并进一步思考如何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更好地贯彻落实“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国策，使中医走上综合创新的康庄大道。雅君过人的智慧在于一下子就能把握住中医哲学的要领和主要脉络，当然这种领



悟也是建立在他长期的资料积累和学术探索工作基础上的。

他后来回到四川，住进一所佛教寺庙，决心以“三年不窥园”的精神专心致志地写《中医哲学史》。他计划写四卷：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医和中医哲学的奠基时期，除了《黄帝内经》这部重要的奠基之作外，中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和开创中医辩证论治之先河的《伤寒杂病论》也成书于两汉时期；第二卷魏晋至金元时期，是中医和中医哲学进入多元互动、“百家争鸣”的时期，金元四大医家的思想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三教合一”的趋向；第三卷明清时期，是中医和传统中医哲学“定型”的时期，如清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医宗金鉴》，就已具有统一的中医学教科书的性质；第四卷近现代时期，西医、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医形成强烈的冲击，中医不仅有从“道医”畸化为“术医”之虞，而且多次出现“存废之争”，中医和中医哲学要摆脱这种尴尬处境，就必须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走综合创新的道路。作者的雄心是要写出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原创性的中医哲学史，力图为该学科的建设发展奠定较为坚实的学理和史料基础。全书计划写 200 万字，从已完成的第一卷已逾 60 万字来看，其整体规模大概不会少于这个字数。

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动辄要写 200 万字的巨著，他是何方神仙？我是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的：一是时代呼唤中医哲学的重建，加速该学科建设（包括中医哲学史）的工作总要有有人来做；二是要看作者有没有足够的学术准备和研究基础。

中医本来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在近现代却遭到了如此不堪的命运，以至到今天，中医一方面为解除

人民群众的病痛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方面还要受到“中医不科学”、“取消中医”之类噪音的干扰和羞辱。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必然会“激”起有识之士的不平之鸣，“逼”出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求真之作来。我以为这就是《中医哲学史》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再从作者本人来看，雅君出身于有中医背景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中医药及其疗效已有所粗知；以后又接受了系统的中医科班教育，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先后获得医学硕士、博士学位；他在来哲学所做二站博士后之前，已在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做过一站博士后研究，师从该所所长李刚教授研究道教医学和哲学。医学与哲学两个方面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视野结合在一起，使他确定了中医哲学这个研究方向。今年 36 岁的程雅君已出版《金元四大医家与道家道教》（2006）和《医道還元注疏》（2008）两部专著，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从内容看，多数都在中医哲学和中医哲学史的范围內。雅君对中医的近现代境遇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有振兴中医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他是把中医哲学当作自己的“生命的学问”、付出全部心血来进行研究的，所以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并且乐观其成。

我大略地翻阅过他的第一卷书稿，联系平日交谈和在电子邮件中讨论的一些问题，觉得以下几点对中医哲学学科发展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至少作为一家之言亦应引起重视：

一、关于中医和中医哲学概念

作者认为作为一种学问的中医就是“中华医道”。《黄帝内经素问》记载了一段黄帝与雷公关于“医道”的对话：“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



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至教疑于二皇。’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① 这段问答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医之道”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也就是说，中医之道必须结合天文、地理、人事等诸方面因素，对人的生理、病理现象作整体系统分析。其二，掌握医道必须经过“诵”、“解”、“别”、“明”、“彰”五个循序渐进的认识步骤，才有可能学到神农之教。这种“可传后世，可以为宝”的医道，就是现代所谓的中医学。

怎样认识中医这门学问之博大精深，做一个精通医道的“大医”需要有怎样的“习业”即学术素养呢？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有一段名言：“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至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老庄，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

^① 《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十三“著至教论篇七十五”。

尽善尽美者矣。”^① 这里谈到了“大医”即医道之大成者必须具备的五个方面的学识素养：一是要熟悉《素问》、《甲乙》、《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等中医药经典，以及张仲景、王叔和等历代名医的诸部经方；二是要熟读“此方”即孙思邈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三是要灵活理解和运用阴阳家、易家的诸家相法和筮法；四是要广泛涉猎五经、三史、诸子、老庄、佛经等各种传世文化典籍；五是要具有天文、地理、历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由此可见，中医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以国学的多学科知识为其产生和发展背景的，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结合。当然，在古代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也难免掺杂某些用想像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乃至虚妄、迷信的成分。

内容如此丰富复杂的中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术”两个层面。中华医道的特点是以道御术，以术载道，道术并重，这就是传统所谓的“道医”或“哲医”，而不同于近现代失落了传统中医精神、重术轻道的“术医”。传统中医学是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容的，“哲理”和“医理”互相贯通，互相发明，彼此形成良性互动。二者均属于形而上之“道”的范畴，不过前者的抽象层次更高，后者与医疗实践活动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如何从“医理”以究“哲理”，又从“哲理”以竟“医理”，是中医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概言之，中医哲学就是研究中医学中的形而上之“道”的一门学问。我认为作者对中医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的这一定位是确当的，研究者也可得门径而入。

^① 《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论大医习业第一”。

二、中医哲学的研究内容

根据对中医哲学研究对象的把握，作者认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中华医道中的生命观、本体观、认识论、方法论、医学伦理思想等哲学性内容。中国哲学对“人”的认识，除了人群（社会）、人生（性情、人生理想、道德修养、成人之道）、人心（精神、思维、认识、心理）之外，还十分注重研究人体（人的生理和生命现象）。从整体看，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哲学”，这是与人们在医疗养生实践中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体认分不开的，是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的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中华医道与儒、道、释等各派中国哲学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哲理”和“医理”的互动突出表现在儒、道、释三教哲学都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医在不同时期融摄不同的哲理入医，从而具备了不同的哲学特征，形成为不同的医学流派。因此，作者把清理儒、道、释哲学对各派中医学说的影响看作是中医哲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同时也在一些章节里论述了中医理论和实践对哲学转型的推动作用。（三）中医哲学与西医哲学之比较。人们一般都注意到了中医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与西医还原分析方法的不同，但若把中医整体观仅仅理解为空间整体，那么还是难免落入西学之窠臼。作者指出，中医整体观应包括“时间整体”、“空间整体”和“时空整体”三个维度，我们的先哲十分重视“天时”，并形成了以时间统摄空间的“动静合一”的时空整体观，只有这种整体观才能充分体现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四）中医哲学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钱学森先生曾经指出：“中医这个东西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科

学，它是一个哲学，或者说是在早年现代科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所谓的自然哲学”。他断言：“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改造现在的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①关注现代科技的这一发展趋势自然也是中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中医哲学的研究方法

中医哲学是一门交叉科学，从业人员既要懂中医，又要懂哲学，需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基本功。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医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重其术而略其道”，把中医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实用科学技术，而忽视其哲理基础和人文精神，不了解其孕育、成长和发展的中国文化背景。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强调在今天，应更加注重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和中医哲学。在他看来，文史哲的研究取向皆不可少：文献是基础，史学是宽度，哲学是深度。比如，中医典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占有很大比例，但一直缺少系统规范的整理，在我国有“佛藏”（《中华大藏经》）、“道藏”（《中华道藏》），近年来又在编“儒藏”，然而编纂《中华医藏》的工作却迟迟没有提上日程。显然，整理编纂“医藏”的工作需要中医学专家与古典文献专业人士的通力合作。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医哲学史更需要有中国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科学技术史的宽阔背景，所以我认为作者突出强调该学科研究方法的人文取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其

^① 钱学森：《用马列主义哲学阐述中医理论》，《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次，作者还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运用到《中医哲学史》的写作中去。该书原计划写三卷：①“道医卷”（相当于先秦两汉时期）；②“儒医卷”（相当于唐宋金元和明清时期）；③“术医卷”（相当于近现代时期）。他在形成了从“三教合一”到“三流合一”的思路后，改为现在的四卷，将“分类治史”与“分期治史”较好地结合起来。此外，中医哲学研究还要运用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科技哲学的方法和其他交叉科学的方法，比如要扩大其国际影响就要借鉴文化传播学的方法等。研究对象的历史含量、哲理深度和交叉科学的特点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四、中医哲学的“返本”与“开新”

从“三教合一”到“三流合一”是本书最重要的结论，是作者考察了全部中医哲学史后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为中医哲学学科今后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在西学和西医传入前，传统中医学虽然也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其哲理基础有从以道家、道教、道学为主到以儒为魂、以道为体、以释为用的“三教合一”的演变，但始终没有丢掉以道御术、以术载道的“道医”或“哲医”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华医道之“本”。在西学和西医的冲击下，近现代陷入“西体中用”困境的中医一方面丢掉了传统的哲理基础，另一方面又难以与西医之“道”接轨，因而在“术”的层面也日渐萎缩，并一再受到“废除”之声的威吓和打压。中医要摆脱这种困境，就不但要有民族文化的自觉，而且还需找到一条“返本开新”的现实道路。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条道路就是从“三教合一”到“三流合一”。“返本”并不是要回到历史上的某一家或某一派中医学说，而是要回归以道御术、以术载道、道术并重的中华医道精神，是从“术医”向“道

医”的回归，是中医哲学的重建。“开新”则更需具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开拓中医哲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境界。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我曾经讲过“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①几句话，很高兴能得到雅君的认同，并把它运用到中医哲学史的研究中去。就中医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特别是要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坚持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学为体”是以传统中医哲学为根基，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医道为中华民族医药卫生事业传承、创新、接受外来文化滋养因而得以生生不息、日新发展的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西学为用”是以西方以及世界各民族生命科学和医疗实践的丰富资源为“他山之石”，为有选择地学习借鉴的对象，不但不排拒而且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合理成果为我所用。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是比儒、道、释“三教合一”层次更高、范围更广、意义更为深远的一次综合创新，是中医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当然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雅君的大著即将出版，我所看重的是它对中医哲学学科建设的推动意义。新一轮中医存废之争后，近两年的舆论环境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中医复兴和中医药事业新发展的，包括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现任卫生部长陈竺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明确表态支持“中西医并重、结合”的基本国策，主张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在唯物

^①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辩证法的指导下，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 21 世纪新医学。学术界也多次召开关于中医哲学和中医文化的研讨会，一些重大科研课题和国情调研项目正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要出成果显然尚需时日。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中医哲学史》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它提供的大量资料和关于中医哲学的研究思路，将对中医哲学的重建和这个学科今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可资比较、借鉴的参照物亦功莫大焉。

本书中的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作者也多有独到见解。比如，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作者既不同意“远古说”和“战国说”，也不同意“西汉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帝内经》主要是经过齐梁间医家全元起注、唐王冰次注、宋林亿、高保衡等校正的本子，王冰补入七篇大论对中医学的贡献很大，林亿等校正本“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亦功不可没，所以作者认为《黄帝内经》是“成篇于先秦，成编于两汉，大成于唐宋”的中医学奠基之作。当然，此类学术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但我们相信，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总会逐渐成为共识。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后人如果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看法，那也是很正常的，并能体现出本书推动学术进步的作用与价值。

在今天，中医哲学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处于“返本开新”的关键时期，我相信学术界会非常欢迎这部《中医哲学史》的出版，也希望作者再接再厉，按计划把后面几卷及时地顺利地推出来。

方克立

2008 年 12 月 24 日

序 二

2007年春夏之际，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打电话给我，自报家门：“我叫程雅君，四川大学教师，今年7月要来读您的博士后。”——在此之前，我因为主持“中医典籍与英译工程”，是没有考虑要带学生的，但这位青年学者的求学精神与知识结构让我比较感兴趣：中医学博士，已经读了一期哲学博士后，现在是来进行二期博士后研究。他还说就是冲着中医哲学来的。

本来我对雅君的安排是边进行博士后研究边坐门诊，这样多少有点收入，但雅君婉言谢绝了。他对我的助手张南说：“张老师，我知道这是罗老师和您的好意，担心我经济拮据。但我是来求学的，老师能帮助我在学术上真正提高是我最大的心愿。”这是我几乎没有想到的。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想着兼职赚点钱，而雅君已经是博士后了，来读二期博士后还如此执著于“学”，我认为这是他能够学有所成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雅君第一学期住在研究生院，离我很近。那个时候，一些学术会议我经常叫上他，他也很乐意参加。过了三个月，他提出：“该了解的学术动态了解了，是否要沉潜下来搞自己的东西呢？”我同意并支持他这么做。因为既要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又能沉潜下来做



自己的学问，这对一个年轻学者的成长是必须的。

于是，喜欢禅定的雅君回到四川，在一个偏远的寺庙住下，开始了青灯古佛夜读书的生活，开始了《中医哲学史》的撰写。

在具体的关于中医哲学的学理上，雅君和我交流很多。如中国哲学应该包括医、儒、释、道四大金刚，国家应该有中医哲学社科发展规划，中医立法不能照搬西医等等。雅君的治学思想与我合拍，并且能较快形成文字。这已经表现在《中医哲学史》里面。

应该说，《中医哲学史》有很多创新之处，这是由于《中医哲学史》的开拓性决定的。但也正是其开拓性，决定了其争议也在所难免。雅君曾问我：“我不太倾向用西学来论证中医是否科学，因为这样做的本身已经对中医不公平。为什么非要符合西学的才算‘科学’呢？如果尽这样拿西学的筛子来‘筛’中医，中医还有什么特色和优势？”我认为在这个研究取向上，雅君看问题是尖锐的，定位也是准确的，所以支持他按照方克立先生“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教导大胆去做。

关于《中医哲学史》的具体内容，方克立先生已有高论。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是在方克立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雅君能得到方先生的指导，我由衷高兴并为雅君感到幸运。我认为方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方先生主要是谈“文”，作为雅君的博士后导师，主要从“人”上说说我的看法和希望。

一、厚道为人，厚重为文。我曾经引用黄心川先生之语教导雅君：“即使学问做不好，把人做好也是一种成功。”我亦以自己倾30年之心力完成《本草纲目》、《东医宝鉴》等英译工程为例，告诫雅君“厚重为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相信雅君是听进去了的。有些深藏在雅君心灵深处的东西，一种深沉得近乎忍辱的“阴